

历史书写与边疆少数民族国家意识的形成

——以云南佤族为例^{*1}

李晓斌 王燕

(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云南 昆明 650091)

[摘要] 边疆少数民族国家意识的形成是中国历代王朝国家对边疆整合及族际互动的结果。历史书写是王朝国家对边疆少数民族整合的主要文化形式。在这种国家文化主义影响下, 王朝国家构建完备的历史书写范式, 持续不断地进行典范历史书写, 确保体现王朝国家历史意识的历史书写能有续、持久地实现由上而下的文化构建。这也是边疆少数民族能由下而上构建起回应的前提和基础。边疆少数民族则通过复刻传说神话等争取中国身份的行动形成回应。在这两者互构的基础上, 作为王朝国家历史书写对象的边疆少数民族不再是个无关的认知者, 王朝国家的历史意识成为两者共同构建的文化想象, 形成共同的历史认同, 边疆少数民族的国家意识得以增强。论文论证了国家与边疆民族两者历史叙述的互构在边疆民族国家认同产生中的作用, 以寻求理解边疆民族国家认同的理论途径。

[关键词] 历史书写; 国家意识; 历史认同

[中图分类号]D63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110(2016)06-0017-08

正史是中国古代构建社会记忆最重要的一种形式结构, 作为传承社会记忆的最重要的历史文本, 他与当时的社会情境有对应关系, 即一方面, 历史书写是对社会现实的记录; 另一方面, 历史书写不仅仅是记录社会现实, 也能作用于社会, 不断强化社会现实的历史意识。中国传统的正史、方志文类, 其书写结构是由中央到地方制度与组织的政治权力支持的, 即社会情境结构对历史书写文本结构影响的结果。^②因此, 对历史的书写特别是边疆民族的历史书写也是受到王朝国家知识权力的影响, 是王朝国家知识权力支持、决定的结果。愈是结构稳定, 制度完备的王朝, 也愈能体现王朝国家对民族书写的要求, 当用正史的结构来书写边疆民族的历史时, 这种体裁类型已经体现并表达了该民族为国家一部分的意义。故当历史文本不断书写, 于是该民族作为国家整体之一部分的意识也就不不断强化。这一过程中, 社会借此可以规范社会集体记忆的生产, 以合宜的记忆来维持和强化中国封建社会大一统格局的形成和稳定延续。

下文中, 我们将以佤族为例, 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分析典范历史书写与社会现实发展演进之间形成的互构关系, 以及这种互构

¹ ***[作者简介]** 李晓斌, 男, 昆明人, 云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西南跨境民族史。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缅跨境孟高棉语民族的历史重构与身份建构”(14BZS117)阶段性成果; 云南省高校一流学科云南大学民族学学科建设项目“中缅跨界佤族的中述史与国家认同研究”阶段性成果。

² ①王明珂. 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 12、114.

②方国瑜、马曜、王文光、尤中、张增祺等学者都对“濮人”“百濮”的族属进行了讨论。

关系对佤族国家意识的影响。

一、历史书写中的佤族与佤族的国家意识

(一)对佤族族源演变与分布的历史书写

《尚书》《逸周书》《春秋释例》《国语》等先秦时期文献对佤族的先民——“濮”都进行了记载。从中可知濮人很早就分布在中国的南部和西南部。由于尚未形成统一的政治力量,濮人处于各自为政的状态,故文献中有“百濮”之记。但此时的“濮”族群处于分化复杂的历史演进中,其具体内涵与外延的争议性较大。^②

秦汉时期佤族先民从濮人中逐渐分化出来,被称为苞满和闽濮,《史记·西南夷列传》《华阳国志·南中志》等文献均有“苞满”“闽濮”的记载。《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说,汉武帝开“西南夷”时,“定笮存邛,略斯榆,举苞满。”^③《华阳国志·南中志》载:“永昌郡……,其地东西三千里,南北四千六百里,有穿鼻僮种、闽濮、越濮、鸠僚,其渠帅皆曰王。”^④说明至东汉初年设置永昌郡时,与苞满同一族系的其余众多部落,开始纳入了永昌郡内,将其记之为“闽濮”。^⑤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闽濮仍然是原永昌郡、兴古郡的主要族群之一。

隋唐五代时期,《云南志》中的“名类”“云南城镇”及《新唐书》“南蛮列传上·下”记载了永昌地区的望苴子蛮、望蛮、望外喻从汉晋时期的闽濮中分化出来的过程,但这些记载仅百余字,内容极为粗略,“望蛮”“望苴子蛮”“望外喻”等称谓是指一个族群,还是多个族群,其内部结构如何,这些问题从文献中难以得到深入的认识。

宋朝时期,由于统治者对佤族地区的设置不深入,认识不多,相关记载省略。元朝李京的《云南志略》提到“蒲蛮”,但说“一名扑子蛮”,^⑥说明唐代以后望蛮已经开始分化成为蒲蛮。

明清时期的文献对佤族先民记载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更详细地对其分化的不同部分进行了记载,因此,出现有古刺、哈刺、哈杜、哈瓦、戛喇、哈喇、卡瓦、阿卡等称。明代首见于《百夷传》:“古刺,男子衣服装饰类哈刺。”^⑦《滇略》卷九载:“古刺,

³ ①[汉]司马迁.史记(卷117)·司马相如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53:3049.

②[晋]常璩.华阳国志(卷4)·南中志[M].顾广圻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60.

③尤中.中国西南民族史[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62~63.

④[元]李京.云南志略[M].王叔武辑校.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96.

⑤[明]钱古训.百夷传[M].江应樑校注.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101.

⑥[景泰]陈文纂,郑颀修.云南图经志书,卷10 传[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331.

⑦[清]鄂尔泰,靖道谟纂修.云南通志(卷22)·土司附种人[M].乾隆元年刻本.

⑧[清]郑绍谦原本,李熙龄续修.普洱府志(卷18)·土司·种人附[M].咸丰元年刻本.

⑨[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卷4)·南中志[M].顾广圻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60,65.

略同哈刺。”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十载：“哈杜，稍类哈刺。”^④实际上古刺、哈刺、哈杜皆为同一族群的不同部分。天启《滇志》卷三十载：“孟连长官司，……蛮名哈瓦，僿悍好劫。”雍正《云南通志》卷二十四“土司附种人”中第一次出现“卡瓦”记载：“卡瓦，夷中顽梗者也，永(昌)、顺(宁)东南辣蒜江外有之。”^⑤乾隆及其后期的文献多载其为“卡瓦”“佻僿”“阿瓦”“阿卡”，道光《普洱府志》卷十八载：“阿卡，即夷中之卡瓦是也，宁洱、思茅有之。”^⑥光绪时期的文献刘慰三《滇南志略》卷四、岑毓英《岑襄勤公奏稿》卷三十首次出现了“阿瓦”“佻僿”的记载，这是佻族分出来的确切记载的文献。

民国时期佻族多记为“卡瓦”“佻僿”“阿瓦”“本人”等。编撰于民国初期的《清史稿》仍记佻族为“佻僿”，这时期的族称基本被固定下来。

从对佻族的分布的历史记载看，在先秦时期，官方历史记载中的“濮人”分布在西南、南部地区，但具体指什么地方并没有明确，这也与此时王朝国家对该地区的认识有关。汉晋时期，佻族先民苞满、闽濮分化出来，主要分布在永昌郡内，与僿僚广泛杂居。与之前的记录相比，则更为明确，《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南域处邛笮五夷之表，不毛闽濮之乡”，又说永昌郡“有穿鼻僿种、闽濮、越濮、僿僚”^⑦。

唐宋时期，因迁徙，佻族的分布有较大变化。佻族先民望蛮一部分往西北迁徙；一部分从怒江中下游地区迁徙到了东南澜沧江以西地区，望蛮较前期发生了很大的迁徙。明清史籍对佻族的历史书写主要突现的是佻族的迁徙后出现了新的分布格局。明朝初期的佻族先民分布在麓川平缅宣慰司的有古刺、哈刺、哈杜，与大百夷、小百夷、蒲人、阿昌、缥人、怒人等杂居共处。清代，永昌、腾越内外境俱有戛喇，永昌、顺宁东南辣蒜江外(即今之小黑江)及镇边厅有卡瓦，普洱府属地有阿卡、卡瓦，孟连有哈瓦。其区域与今天主要聚居于沧源、西盟、澜沧三县而其余散居于耿马、孟连、腾冲、梁河、镇康、永德等县状况基本一致。显然，从明清的记载可知，明清的佻族先民基本形成了今天分布的雏形，这说明这一时期对佻族先民的分布等基本情况的了解已比较准确和清楚。

(二) 王朝国家对佻族设置经营的历史书写与佻族国家意识的构建

王朝国家对西南边疆佻族地区的治理，使佻族从“化外”之民进入王朝的“版图”，而国家意识从想象到感知的过程，则不仅仅只是王朝国家在佻族先民分布区域的设置及治理的结果，也得益于持续的历史书写所带来对佻族社会集体记忆产生的规范作用。

1. 先秦至唐朝时期王朝国家在“濮”“苞满”“闽濮”地区的设置

先秦至秦时期西南地区与中原王朝的联系才开始建立，但这种联系从时间和范围上都比较微弱和有限。这一时期王朝国家对佻族地区的政治经营的书写主要在于描述相关区域统治从无到有、初步确立的过程。

在建武二十七年(公元51年)、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两次哀牢夷内属的基础上，东汉设立永昌郡。《后汉书·西南夷·哀牢传》载：“永初元年(公元107年)，徼外僿僚种夷陆类等三千余口举种内附，献象牙、水牛、封牛。”这所记的“徼外僿僚种夷”即是中印半岛上孟高棉语族的民族，^⑧与永昌郡内的闽濮相同。^⑨这一书写要表明的是今缅甸北部的佻族先民与中国王朝国家的

^④ ①尤中. 汉晋时期的西南夷[J]. 历史研究, 1957, (12).

^② 尤中. 中国西南民族史[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5: 71.

^③ 王文光. 二十五史中的海外民族史志与中国的文化边疆、政治边疆[J].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2014, (4).

^④ [宋]欧阳修, 宋祁. 新唐书(卷222 上)·南蛮列传上[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2: 6267.

“内附”关系在东汉已建立。同时,以永昌郡为窗口,东汉王朝与国外的联系也逐渐建立起来。这种关系使这一区域在历史上形成了一种具有稳定性和延续性的文化边疆。^⑤

三国两晋时期对佧族管理经营的历史书写主要是围绕永昌郡的兴废来进行的。三国时期东汉永昌郡的设置稍作调整,新设云南郡,原来的范围有所缩小,但仍属于蜀汉管辖;西晋时期西南边疆地区设置也无变化,永昌郡和云南郡、建宁郡、兴古郡一起称为宁州;南朝时期,由于永昌郡内闽濮反抗,永昌郡建置撤销于东晋咸康八年;到了萧齐北魏时期又出现了永昌郡。从永昌郡的置废过程看出中原王朝力量的更迭,其间虽有设置也只是遥领而已,但由于当时西南边疆外并不存在另一个强大的国家力量,因此,边疆并无大的波动。此时的闽濮地区仍然包括了今缅甸北部地区,说明此时的佧族先民仍与今缅甸边境的同源族群拥有共同的生活地域。当然,这一时期王朝国家对该区域也进行过一定程度的治理,蜀汉时期诸葛亮治理南中的政策使南中社会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即使是裸濮、闽濮、鸠僚等族地区,经济文化生活也有所发展。今天云南佧族中存在的诸葛亮的传说,从社会记忆的角度反映了这一时期的设置经营对佧族先民产生的影响。

2. 南诏大理国时期统治者在“望蛮”地区的经营

到了唐宋时期,西南出现了南诏大理政权,当时南诏的辖区“东距爨,东南属交趾,西摩伽陀,西北与吐蕃接,南女王,西南骠,北抵益州,东北际黔、巫”,^⑥史籍中所记佧族的先民均在其管辖范围内。由于南诏大理政权的崛起,佧族先民对中央王朝的想象和感知也通过对南诏、大理国统治主体民族的认识而间接体现出来。由此,也使此间王朝国家在“望蛮”地区的设置经营间接体现为南诏大理的经营。这一时期对佧族先民的记载突出了军事征讨、征发卫士等内容。《云南志》明确记载:“望苴子蛮,在澜沧江以西,盛罗皮所讨定也。”公元762年冬,阁罗凤率兵“西开寻传”,进一步征服金齿、银齿、绣脚、绣面、茫蛮、寻传、朴子、望蛮等部落,将这些地区的不同民族重新纳入到南诏国政权的统治之下;同时征调澜沧江以西的望蛮服兵役,凡出征,“则望苴子为前驱”,望苴是望蛮中被南诏征调的士兵。《云南志》卷九南诏兵志,“罗苴子为精兵,有四军苴子,盖望苴子为其一”^⑦。这些关于佧族先民的描述,表明南诏通过军事征讨、征发卫士等方式将佧族先民纳入统治。此外,统治者还通过军事移民的方式,将部分望蛮迁徙到今昆明城与其他民族交错杂居,“拓东城,广德二年凤伽异所置也。其地汉旧昆州,故谓之昆池。……贞元十年,(南诏)从永昌以望苴子、望外喻等千余户分隶城傍,以静道路。”^⑧

3. 元明清时期对佧族设置经营

元明清时期对佧族管理经营的历史书写主要侧重于描述元明清王朝如何通过不断改进完善的土官、土司制度来实现对佧族先民的管理经营。元王朝时期,在西南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参用土人”、“以土酋为官”的政策。明朝开始,在西南地区大量设置土司,土官土司作为朝廷“命官”,通过朝贡和纳赋的形式向朝廷表示臣服与归属,王朝中央通过土官土司实现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管理,从某种程度上讲土司土官是国家在这些地区的代理人,土司治下的民族对国家的认同直接转化为对土司的认同。明朝

⑤方国瑜. 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M]. 北京:中华书局, 1987:331.

⁵ ①[唐]樊绰. 云南志(卷6)·云南城镇[M]. 向达校, 木芹补注.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5:80.

②尤中. 中国西南民族史[M].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5:264.

③佧族简史编写组. 佧族简史[M]. 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 1986:13~14.

④王明珂. 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12, 106.

⑤(法)米歇尔·德·塞尔托. 历史书写[M]. 倪复生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12.

中央政府在佤族地区的设置有孟连长官司、孟定御夷府、镇康御夷州。从《清一统志》所载看,孟连长官司包括了今孟连、澜沧、西盟三县及今孟连、西盟两县西部境外的萨尔温江以东的阿佤山区在内。^②清朝初年,佤族主要居住区隶属镇康州、孟定府、耿马宣抚司和孟连长官司,康熙四十年(公元1701年)孟连长官司升为宣抚司。乾隆二十九年(公元1764年),耿马和孟连两个宣抚司由原来隶属于永昌府改为隶属于顺宁府。光绪初年,耿马宣抚司升为宣慰司,镇康“改土归流”,析耿马地置勐角、勐董土千总、班洪土都司,析孟连地置西盟土千总、上勐允土千总、下勐允土千总,并于光绪十三年(公元1887年)建置了镇边直隶厅。^③今孟连、西盟、澜沧、沧源及缅甸北部“佤邦”大部分地区的佤族,均属以上行政建置中。

通过对上述文献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佤族的历史书写包含的两层信息。其一,不同历史时期佤族分化重组演化的情况、中央王朝在佤族地区设置的情况。这些内容是历史文献直接记录下来的,是对佤族自身分化演变结果的客观反映,属表述性知识。另一类的信息,则是文本书写中所包含的默示性信息。“默示性知识讯息经常存在于人们的意识之外,不为对话者双方察觉,因不易被人们察觉,所以这样的社会记忆所强化的社会情境(社会本相)根深蒂固,社会也因此而延续。”^④通过对上述表述性知识的叙述,可进一步分析这些历史书写中所要传达的默示性信息对于佤族王朝国家意识构建的作用。

历史书写是历史叙述的一种表现形式,是历史记忆的书面表达。从具体的操作层面看,历史书写可以理解为书写主体从某种特定语境出发,带有目的性的历史再现或历史建构,“背后都隐含着历史学家所希冀的教育和动员的责任”。^⑤纵观王朝国家时期正史与方志文献对佤族先民的书写内容都极少,叙述往往围绕佤族先民的族称演变、分布区域、“奇风异俗”等展开,用语极为简略,比如作为正史的《新唐书·南蛮列传》中涉及佤族先民望蛮的记载仅仅一百余字。尽管如此,统一多民族王朝国家体系下的佤族历史书写,是王朝国家基于大一统思想展开的统一多民族王朝国家的历史建构。通过对佤族历史的记录,将佤族历史纳入到统一多民族中国的历史,实现中央王朝国家意识的构建;同时,国家这个书写主体赋予了佤族历史记忆保存与建构的“正统性”,使佤族获得了王朝国家认同形成的合法性,是国家将佤族纳入王朝体系的重要体现,也是佤族王朝国家认同形成的合法性根源。

具体而言,作为王朝国家知识权力支持、决定的结果,在大一统的王朝国家不断推进的历史背景下,历代官修史书通过对佤族族源分化、迁徙、分布、其分布地的行政区划设置等方面的内容的书写,通过最早记录、命名、持续经营的书写来表达和构建佤族作为王朝国家西南夷的身份。通过这种文本的建构来传递相关默示性信息——佤族为王朝国家之西南夷。故当历史文本不断书写,正史——王朝国家的典范历史作为中国古代构建社会记忆最重要的一种形式结构,也就完成了由上而下构建起大一统的社会现实背景下的佤族作为王朝国家整体之一部分的历史意识的过程。

但这仅是历史书写与社会现实二者关系中的一部分。历史书写与社会现实的发展演进之间具有互构关系——典范历史书写与社会现实回应。从先秦两汉到宋元明清,王朝国家不断推进的大一统的社会现实决定了中国古代历史书写与构建的基础。在西南民族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推进的大一统社会现实塑造了对西南边疆民族历史的想象和建构,即按大一统的模式来书写和记载边疆民族。在历代王朝国家建立大一统王朝的强力推动下,其历史意识和书写的结构是相应的——一种呈现大一统的“典范历史”^⑥或典范边疆民族史。典范边疆民族史是王朝国家不断推进大一统的社会现实的社会历史记忆。这种文化想象更多地体现着王朝国家的历史意识,对于刚刚纳入王朝国家统治的边疆少数民族,这种历史意识可能只是王朝国家主观的单方面的想象与建构。例如,最早对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的记载,基本都是以前汉文化为参照来做出描述的,反映出“表述危机”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但随着王朝国家对西南边疆统治经营的不断推进和深化,对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的记载不断深入细致,更为重要的是,中原王朝历史书写中所包含的各种默示性信息开始影响到了西南边疆民族,而这种默示性信息根深蒂固,不易改变,并不断延续,进而对民族的集体记忆产生影响。虽然这种记忆一开始只是中央王朝由上而下构建的记忆,但随着延续,随着记忆的层累,这种记忆也逐渐转化为民族自身的由下而上的记忆。到近代,这种历史构建得到了西南边疆民族不同程度的回应。因此,王朝国家的历史书写在历

^⑥ ①王明珂. 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 :1, 37.

②EndelTulving. Organization of Memory[M]. New York: AcademicPress, 1972: 381-403.

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影响到了其书写对象,最后王朝国家的历史构建也得到对象的认同回应,王朝国家的历史构建成为两者共同共有的历史认同,其书写的对象不再是个无关的认知者而成为共同的历史构建者,推动两者的互构。

佤族也是这样,那么在历史书写与社会现实二者关系中,针对典范历史对佤族的书写,佤族如何回应呢。

二、佤族国家意识的体现:对典范历史书写的回应

从先秦两汉到元明清,随着大一统王朝对边疆经营的加强和拓展,王朝国家不断完成由上而下典范历史的构建,也逐步也得到边疆民族的回应,形成由下而上的对典范历史的回应,这一过程是国家以官修史书来明确和传播典范历史至民众记忆中,以此塑造同质性大一统王朝与王朝国家成员的结果。

具体就佤族而言,首先,从先秦两汉到清末,典范历史对佤族的书写,成为佤族构建其“语意体系”^⑧的基础。作为人类记忆两大体系之一,语意体系以历史书写为基础,相比幕像记忆而言更不易受个人主观情绪的影响,因此成为佤族构建整个佤族社会记忆的基础,佤族以官修史书语意体系作为其整个民族社会记忆的基础,也因此为由下而上地回应典范历史体现国家意识创造了条件。

其次,佤族对王朝国家的认识和认同经历了一个自发到自觉的过程。佤族所体现出来的对国家的认同即是在历代封建王朝统治经营的基础上,对由上而下的典范历史的回应。这种回应集中体现在诸葛亮传说的复刻和中缅勘界等文化事项或事件过程中,并以中缅勘界体现得最为明显。佤族的这种大一统的社会现实发展演进与典范历史书写之间形成的互构,使王朝国家对佤族历史叙述从原来只是王朝国家中掌握知识权力的个人或群体所主张的历史和文化,变成了中心、边缘——王朝和佤族精英都共同主张和认可的历史和历史意识。

(一)佤族关于诸葛亮传说的复刻与回应

诸葛亮在平叛南中大姓叛乱的过程中并没有到达过佤族地区的,但佤族中流传的诸葛亮的传说,主要是关于诸葛亮教会佤族种植水稻、建造房屋和猎头习俗。佤族通过复刻诸葛亮传说,从以下几方面形成由下而上地对典范历史的回应。

首先,这些传说是佤族建构与王朝国家的历史关联性的重要符号。诸葛亮实际上是中原政治家成功治理西南边疆的符号。从这个层面上看,诸葛亮的记忆与其说是对其个人的记忆不如说是少数民族对推动南中发展的民族政策和中原政治家的一种记忆。也因为如此,诸葛亮虽不曾深入到佤族地区,但佤族仍根据自身的需要来复刻他的形象,突现诸葛亮在佤族历史文化发展中的重要地位,特别是通过诸葛亮的传说来建立起一种政治从属关系的历史发展过程。所以在近代边疆民族危机中,诸葛亮记忆成为边疆少数民族阐述他们与国家关系的根据之一,如佤族在抗英斗争中将自己与中国的联系追溯到诸葛亮南征时期:“佻佻诸地,自孔明先生南征以还,就受了汉朝的天恩浩德,在数千年前,我们的祖宗就臣服中国。”^⑨因此,准确地说,这是一种选择性复刻,选取诸葛亮形象与当下需要有密切关联的部分重构阐释,这种原来历史形象与当下历史需要之间的重构关系也体现了文化象征的连续与断裂的关系。

其次,传说反映了典范历史对少数民族神话和边缘历史整合的功能和作用。

⁷ ①访谈对象cwd,沧源县档案馆,访谈时间:2015年2月5日。

②王明珂.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根基历史的文本与情境[M].北京:中华书局,2009:48.

③张凤岐.我参加中英滇缅南段未定界会勘委员会的经过纪实[A].王敬骝.佤山纪事[C].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7:628.

随着大一统王朝在边疆经营的深入,典范历史对边缘历史的整合也会越来越明显,具体体现为边疆民族对典范历史及历史意识的接受认同。由此,其历史或神话传说的建构也逐渐回应典范历史。在典范历史对神话传说整合的基础上,构建起佤族对典范历史的回应。正是通过这样的传说逐步建构起佤族历史与中原王朝历史的持续性,构建起佤族的历史和国家认同。

再次,在民族所记忆、建构与想象的族群历史中,最常见的内容结构是英雄祖先与弟兄祖先两种叙事结构。两种内容结构分别回应着不同的历史心性,其中,英雄祖先历史心性在华夏形成的情境中产生,它也从此与华夏情境相生相成,^⑧因此,他所对应的是大一统的历史心性。诸葛亮的传说是佤族建构的具有英雄祖先历史心性叙事结构的传说。佤族把诸葛亮构建为阿公阿祖,建构起拟血缘关系,从而为英雄祖先结构创造条件。因此,诸葛亮传说的建构可视为佤族对大一统叙事的回应,同时通过这样的方式构建了居于中央王朝与华夏边缘的认同。

最后,沧源佤族的诸葛亮崇拜之所以能够延伸到佤族社会深处,是因为这一代表国家的符号已经与民族精英对佤族社会的统治诉求相结合,从而也就符合了民族精英的诉求。1934年2月21日,英国军队占据我国炉房、班洪等领土,班洪老佤王组织佤族武装,剽牛盟誓:效忠阿祖阿公——诸葛亮。诸葛亮这个符号在佤族精英实现对佤族社会的统治诉求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佤族首领以诸葛亮崇拜实现佤族各部的整合团结。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其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互嵌。

(二)近代佤族对典范历史的回应:中缅勘界与中国佤族对“中国”身份的争取

近代中缅勘界过程中,佤族多次提供证据、指认界限,不断证明自己的中国身份。他们对身份的争取从1936年中英第二次勘界一直持续到1960年中缅划界。其中以班洪胡家和班老保家为代表的佤族精英对“我是中国人”的争取,集中体现了佤族对“中国”身份的争取过程。

佤族对“中国”身份的争取,体现了近代佤族对典范历史的回应,也体现了佤族近代民族国家意识的形成。

1936年冬至1937年春,在中英滇缅南段未定界会勘中,佤族头人积极配合中方勘委会的调度,提供三代人和“汉官”云贵总督的行政隶属关系和证件、证物以及他们和边地汉官或傣族土司的行政隶属关系并展示文件、委札、信物等,证明与中国的隶属关系。^⑨1936年12月中方委员会进入绍兴、大蛮海、困马等地(今属缅甸“佤邦”),大蛮海头人和中方举行剽牛盛会,歃血为盟,愿出席勘委会,作为中方证人,证明大蛮海属于我方澜沧县上勐允土司所辖,绍兴头人出席并证明绍兴佤族部落曾归耿马傣族土司所辖。班老头人锡龙散勐则提供明末李定国进入班老开矿时,假永历帝之命敕赐给班老王的金印,乾隆时期吴尚贤与班老王蜂筑约定开矿的木契等证物^⑩,据此证明滚弄江以北属中国领土,坚决申明班老要在中国。班洪头人也向勘委会展示了相关物证,包

^⑧ ①赵明生. 茂隆银厂与“班洪抗英事件”[A]. 段世琳. 班洪抗英纪实[C]. 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8:412.

②张凤岐. 我参加中英滇缅南段未定界会勘委员会的经过纪实[A]. 王敬骝. 佤山纪事[C]. 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7:624~628.

③方国瑜. 班洪风土记[A]. 方国瑜文集(第4辑)[C]. 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3:512.

④徐志林. 1953年去班老[A]. 张有钧. 终生难忘的几件事[A]. 王敬骝. 佤山纪事[C]. 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7:149,62~63.

⑤王敬骝. 国门卫士佤族“三保”事略[A]. 王敬骝. 佤山纪事[C]. 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7:15.

⑥王明珂. 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12,37.

⑦王文光,施芳,等. 中国民族史学发展述论[J]. 思想战线,2012,(4),93.

括班洪王印、总管印、文书等,当地佤族称为“公章”,这些证物的来源充分证明了佤族与中国的联系。

班老、班洪的头人出席作证回到班老后,即通知十七部落王子“集议于塔田”,共同致函勘界委员会中立主席伊斯兰,坚决表示:“上葫芦王地的各王永远归属中国,绝不愿归英国管辖。若果中立委员长将所属部落和村寨划归英国,则佤族人民只有全部迁徙到中国已定界领土内定居”。^②随后班老王胡玉堂、班老部落头人保卫国等17王又剽牛盟誓,成立佤山民众自决代表大会,发布了《佤山十七王敬告祖国同胞书》,再次陈述了阿佤山自昔属于中国领土,表明阿佤山民固守边疆,世及弗替的决心。会勘中班洪胡忠汉对会勘委员方国瑜先生说:“我不大会说汉话,我说一句就是一句,我家几代人都服汉朝,汉朝对我家好,我不能背叛先祖,不能背叛汉朝。炉房银厂是汉朝的,我们为汉朝看守,我不能失了先祖之意。”^③

1953年8月,保卫国到勐董见沧源驻军政委兼中共沧源县委书记赵廷俊,向政府展示了祖上传下来的古印、朝服、木刻等物,声明班老历来是中国领土,班老人是中国人。保卫国还拿出他家世代珍藏的朝廷官服、“班老王印”、木刻等证物,一再强调他是中国朝廷的命官,他们是中国人,说“中国不能把班老丢掉”。^④1954年,保卫国把朝服、“班老王印”和木刻交给了政府,请求中国政府为他们做主。^⑤

以班洪胡家、班老保家为代表的阿佤山各族人民对“中国”身份的争取,形成由下而上地对典范历史的回应,显示佤族“我是中国人”的身份认同。1960年1月28日,中缅两国总理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缅甸联邦政府关于两国边界问题协定》,将班洪部落、班老部落划归中国,成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这一结果与班洪、班老为代表佤族对典范历史的强有力回应直接相关。

三、典范历史、社会现实的互构与边疆少数民族的国家意识

马库斯等西方学者提出了表述危机的概念,认为学者缺乏科学的方法来描述社会真实的本相。因为“这些制度、体系以及结构与象征意义,均难以摆脱研究者自身的文化想象,而与研究者之行为与认知无关”^⑥。但是佤族的典范历史与社会现实之间的互构关系,则使历史书写对象——佤族不再只是一个无关的认知者。

从王朝国家时期佤族国家意识的构建过程来看,传统史籍对佤族的叙述、王朝国家在佤族地区的设置,都对佤族的国家意识构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佤族的历史书写,是从王朝国家大一统的思想出发,基于“内华夏,外夷狄;贵华夏,贱四夷”^⑦的民族史观展开的历史叙述,是为“华夏帝国”建构的目标服务的。佤族历史的书写程度、书写内容与王朝国家对佤族的认识与治理程度密切相关,因此,佤族进入王朝国家的历史书写体系中,是王朝国家对佤族地区认识与统治的结果,是佤族与王朝国家统属关系存在的依据。

王朝国家历史书写的这种历史意识在王朝国家经营西南夷的初期可能只是王朝国家主观的单方面的文化构建,但随着王朝国家对西南边疆统治经营的不断推进和深化,中原王朝的历史意识开始影响到西南边疆民族。到近代,这种文化构建得到了西南边疆民族不同程度的回应。其中,佤族的回应是比较积极的,集中表现在诸葛亮传说的复刻和近代以来争取中国身份的过程。最后王朝国家的历史意识也得到书写对象的认同并形成回应,在这两者互构的基础上,王朝国家历史书写的对象不再是个无关的认知者,历史意识成为两者共同共有的文化想象,形成共同的历史认同。

王朝国家构建完备的历史书写范式,持续不断地进行典范历史的书写,确保中央王朝体现其历史意识的历史书写能有续、持久地实现由上而下的文化构建,这也是边疆民族能由下而上构建起回应的前提和基础。能否形成回应取决于历史书写这一前提,回应的形成确保典范历史与社会现实的互构得以完成,回应的强弱取决于其历史发展过程中,这种互构过程历史长短。在此基础上,边疆民族的历史认同和国家意识才有可能加强,虽然很大程度上是间接的、文化的,但通过这一互动完成了包括佤族在内的西南边疆许多少数民族对华夏与边缘共同体的想象。